

【论 文】

中国情结：华化、同化与异化¹

王赓武

今天参加纪念费孝通先生诞辰100年的学术会议并作为第四届“费孝通纪念讲座”的主讲人，我感到非常荣幸。因为我在海外生长，对中国的乡土环境了解很少，看了费先生的书，才稍微了解一点中国传统的绅士社会和社会结构。后来我开始研究华侨社会的时候，进一步了解社会学、人类学对我们海外华人社会研究的贡献是如何重要。

费先生在晚年时倡导中国人的“文化自觉”。从我的出发点看，海外华人其实很早就有一种“文化自觉”，但与国内汉人的“文化自觉”性质不同。这是因为海外华人和当地人在一起时，无论是做生意还是平常来往，在交流时明显感觉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或者是汉人，或至少是来自中国的人。在早期的来往中，就会有这种“自觉”。但这个“自觉”并没有人很好地写下来，也没有人注意。但是在外国人写的材料里提出了这样的概念。他们的报告和记录的材料里，认为这些从中国来的人——工人也好，商人也好——至少从他们的观点看是有特殊的地方，因此记录下来。这不能算是中国人自己的“自觉”。但是外国文献记录下了中国人自己所认为的他们的文化和风俗习惯到底是怎么回事。

所以，这牵涉到我们在海外看到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外国人从一开始，就把这些华人叫作 Chinese，来自 China。但是，这个 Chinese 和 China 这两个字，当时在中文里很难找到一个适当的翻译。因为在汉语里说到中国人时，有很多词汇都可以用，每个朝代、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称谓、自己的说法。但这些与外国人的所谓 China、所谓 Chinese 都有区别，要去认真地考虑 China、Chinese 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要去翻译，会感觉有困难。

我特别注意到，在外国人的文献里只有这么一个词。不管是来自什么地方或什么样的人，只要是那那边来的，就叫作 Chinese，那个地方就是 China。至于 China 到底在什么地方，China 多大，China 是怎样一个国家、怎样一个文明，他们不一定说得很清楚，但都用这样一个名词。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不管哪个语言（可能俄文除外）都用这个词。在东南亚，所有的语言——马来语、印度语以及西亚语言，一直到欧洲语言，都用这个词。但是，这个词很难翻译。因为，在中国人的文献里，谈起这些出国的人，会说是闽粤的人，也就是福建、广东人，因为他们都是从这里出去的。清朝的时候说有些人是明朝的遗民，是明朝时候出去的，不肯效忠满清。这是我们在材料中所看到的。但是怎么翻译这个 China 和 Chinese，现在有许多困难。最后我们习惯地用“华”字。为什么用“华”呢？最早这个字是用在“华侨”、“华商”、“华工”的称谓里。这些词里用“华”，因为用这个“华”字表示的并不一定仅指汉人，也可能是满人。到海外去的那些所谓“华人”基本上是汉人，但也有少数民族，也有回族或满族，所以不能叫“汉人”，就叫“华人”。

更有意思的是，在我小时候，在华人社会中，用广东话也好，用福建话也好，他们自称为“唐人”，根本不用“汉人”这个名称。所以，我小的时候就有点奇怪，因为我自己的父母是从

¹ 本文为原香港大学校长、现任新加坡大学东亚研究所主席王赓武教授 2011 年 11 月 10 日在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北京大学第四届“费孝通纪念讲座”上的主题讲座，根据录音整理并得到作者审定，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2011 年第 5 期。



江苏出去的，他们反而习惯用“汉人”来称呼，但到了南洋去，发现根本不用“汉人”这个词，都叫“唐人”。他们在广东话、福建话里自称为“唐人”，而北方人到南洋去，自称为“汉人”。由于在海外也有少数民族，也有满族，都参杂在海外华侨社会里，所以后来就用“华”字。“华”就比较接近于所谓Chinese、China。“中华”就代表China。但其实也不能完全代表，在中国话语里分得很清楚，但是外国人不能分得那么清楚，从China来的，所有的人都是 Chinese。

从这里出发，我今天想谈几个字。这几个字也是从“文化自觉”的观点来看的。我用三个词，一个是“华化”，一个是“同化”，一个是“异化”。下面就简单介绍一些为什么用这三个词与文化自觉有关。

一、“华化”的概念

先讲“华化”。刚才已经谈到，“华人”是与 Chinese 最接近的一个词，但是还不能够完全反映出 Chinese 的含义。“华”字在很早的时候就被海外华人接受了，但并不是自称。从有文字记录的材料上看，自称还是以自己的家乡为主，都是某某州、某某县、某某村的人，没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除了“唐人”之外。从来自不用“华”字。这个“华”字是官方语言称呼他们为“华”：“华工”“华商”。但是为什么我用“华化”这个词呢？换句话说，到了海外之后，大家在一块工作、一块做生意时，就了解到他们之间有共同的地方，虽然来自广东、福建或广东某个地方，不管是广府人也好，客家人也好，潮州人也好，还是福建人、闽南人、莆田人、福州人或福建的客家人，他们大家就有一个共同的经验，就是别人称他们叫 Chinese，就用这同一个字，但他们自己的叫法是不同的。如果他们自称是“唐人”的话，为什么不说是“唐化”呢？或者因为有“汉人”，为什么不讲“汉化”？因为根本就没有这个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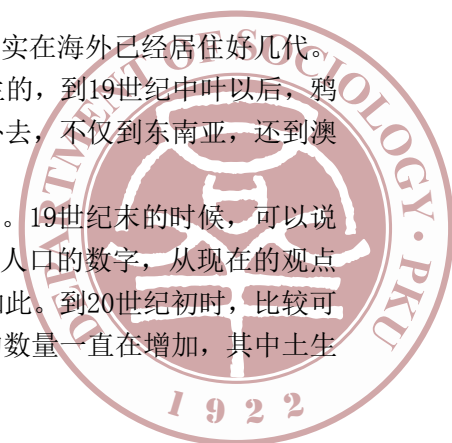
那么为什么用“华化”呢？我现在就先介绍一下，为什么“华化”这个概念是可以接受的。它不仅被认为是一个民族，而是来自中国，都是 Chinese。这就需要找一个共同的称呼，最后还是在清朝末年19世纪的时候，从官方找到一个正式名词，就是现在我们大家用惯了的所谓“华侨”。

“华侨”并不是他们自己称呼的，而是官方文件里称呼他们为“华侨”。由此就开始使用“华”字。从满清政府的出发点来看，“华”这个字是很适当的，因为它代表的不仅是汉人，也包括满人和其他族。我看到的许多中国国内文件档案里都以“满、汉”作为区分。但是，为什么在海外不用“汉人”，也不用“满人”，而是用“华”字，就是因为它包括汉人，也包括满人和其他少数民族。

关于“华侨”这个概念，我写过好几篇文章来考证这个概念的来源。官方认为这些在海外的“华人”，如果是侨居在外面的，认为他们常会回到家乡去，就称为“华侨”。从19世纪开始，虽然政策上实行海禁，但基本上是很宽松的，许多华工、华商经常出入，回家乡去。海禁并没有严格地去处理。

所以，当时侨居似乎并不是不对的。许多那些所谓的侨居者其实在海外已经居住好几代。土生的华人已经有好多。在19世纪初的时候，在海外的大概都是土生的，到19世纪中叶以后，鸦片战争后，出洋的劳工人数越来越多。从1850年代开始，大量到海外去，不仅到东南亚，还到澳大利亚、北美和南美。

从那个时候开始，从中国出去的人数比出生在海外的人数要多。19世纪末的时候，可以说大半都是出生在中国，而出生在当地的是少数。在这100年间，移民人口的数字，从现在的观点来看并不算太多，每年可能一两万人。我们没有正式的数字，大概如此。到20世纪初时，比较可靠的数字显示，至少在南洋，华人已经有三、四百万人。海外华人的数量一直在增加，其中土生



的比例在降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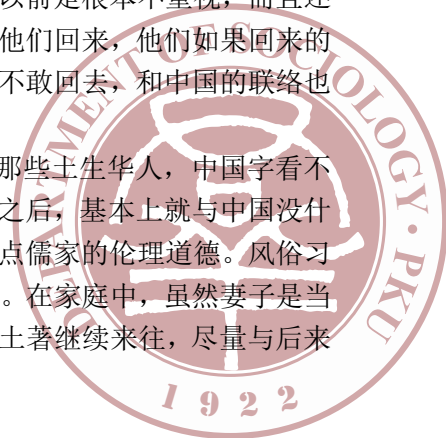
土生华人，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尤其在荷属东印度和英属马来半岛，在这些地方，他们建立起相当强的华人社会。这与其它地方不同。为什么这里就建立了这样规模的社会呢？这与荷兰和英国的殖民政治有直接关系。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英国东印度公司想跟中国做生意，希望利用这些海外华人，让他们回到广东、福建帮助他们打开市场，和当地商人做生意。由于官方限制得很厉害，所以找这些华人帮忙，使他们至少可以打开一扇小窗——大门是打不开的——到广东、福建去做生意。因为有这个政治目的，想利用这些华人，所以在各方面优待他们，承认他们有特殊的地位，跟当地的土著分别得相当清楚。尤其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严格地控制华人的同时也给他们好处。在这种情形下，这些华人就建立了一种可以说是中间社会的集团。一方面比土著的社会地位要高，同时也承认政权、军权还是在荷兰东印度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手中。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了一个华人的社会。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特点呢？在英属、荷属殖民地建立起来之前，大多数去南洋的华人都渐渐地融入当地土著社会，接受土著人的风俗习惯和宗教。至少几百年前，就我们所知这种情况很普遍。因为一般来说，只有少数人出去，多半是单身汉，妇女根本没有出海到国外去的机会。那么单身汉出去，与当地的妇女成家生子，就留在那里，不再回中国。两三代之后，基本上与当地的土著不能区分了。很自然地就成为当地这些国王的臣民，同时也为当地政府服务。他们也做中国的生意，但基本接受当地的风俗习惯，接受他们的宗教，如泰国佛教、西班牙统治下菲律宾的天主教、爪哇的伊斯兰教等，华人基本上都能接受。

但是，由于荷属东印度和英属东印度的政治关系排除了华人被土著人“同化”的现象，华人建立了自己的华侨社会。在这种情况下，“华化”这个概念就是表示他们如何维持、保护、保卫他们自己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他们的集团——华商的网络——也就建立起来了。

同时，不管是从西方的观点，还是从土著的观点，都把华人看成是一个民族，就是“华族”。但没有用这个词，而用 Chinese。不管是哪种语言，都用 Chinese，这就是一个民族。中国没有这个词，中国也不承认他们是一个民族。他们都是各地方的人口即广东、福建的人，从北京和朝廷的观点来讲，他们不是一个独特的民族。他们不过就是在外边做点小生意，来来回回。朝廷允许他们做生意，但是不承认他们有什么身份和地位。在那种情况下，他们在海外反而有地位，被外国公司和殖民政府承认，当地土著虽然不甘愿，但也承认他们是一个特殊的民族，就是 Chinese。在这种情况下，“华化”就有一种特殊的意识，就是一种文化自觉。他们认为，如果能够保卫、延续他们从中国带来的文化，就能够保持他们的身份，商业网络也好，风俗习惯也好，社会集团也好，宗教集团也好，都要依靠这种文化自觉来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华”字就很有意义。所以，在19世纪末官方用“华侨”这个词的时候，就认定他们是有组织、有族群、有社团，而且有相当的势力，尤其是有相当经济势力的。所以，官方就承认他们是一个特殊的集团，用“华侨”这个词来称呼他们。“华”字本来是已经可以用了，又加了一个“侨”字，就是表示他们是暂时在外，希望他们与中国保持联络。所以，官方的态度就改变了。以前是根本不重视，而且还相当地轻视，认为他们是汉奸或不忠不孝、逃亡到海外的人，不欢迎他们回来，他们如果回来的话，不小心就要被处罚。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海外土生的华人根本就不敢回去，和中国的联络也没能很好地保持。

尽管他们跟中国没有什么关系，连中国话都不大会讲。尤其是那些土生华人，中国字看不懂，中国话不会讲，父亲可能还会一点，母亲是当地人，过了两三代之后，基本上就与中国没什么联系了。但是，风俗习惯还保留着，宗教还是信仰三教，也知道一点儒家的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还保留着祖辈、父辈所保留的风俗，也就是闽南或广东的风俗习惯。在家庭中，虽然妻子是当地妇女，但子女尽量与其他华裔或土生华人通婚，尽量地不再与当地土著继续来往，尽量与后来



从中国出来的“新客”来往，与他们的儿女通婚，尽量地保持、保卫中国传统价值观。只有一点难以维持下去，就是文字语言，其他的风俗习惯则尽量地能维持多少就维持多少。这就是我所谓的“华化”。“华化”就是在文化的意义上还保留了“华”的概念，但是没有语言文字。除了语言文字之外，保留了其它的风俗习惯。

这与“汉化”不同。我所了解的“汉化”是北方汉人到南方去，如广东、福建等地，把当地少数民族“汉化”，使其成为后来的“唐人”，这是“汉化”。汉人到西南去，如广西、贵州、云南，这也是“汉化”。但这些在海外的华人不是“汉化”，因为他们的语言文字都没有延续，基本上保留下一些风俗习惯和社团组织，这个叫作“华化”。我认为，这就是一种“文化自觉”——不完全自觉，但至少风俗习惯上还是有相当的自觉，而且保持得相当好。这已经有三百多年了，到现在为止，印尼、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这三个地方还有不少土生华人跟以前一样，保留中国的传统风俗习惯。中国话也不懂，中国字也不看，也没有兴趣，但是保留风俗习惯，而且是真地认为这些是中国传统文化，并认为是值得骄傲的。到现在为止，还是如此。

这些土生华人也保留了自己特殊的文物和档案，他们用马来文写下的东西，他们写信用马来文写，他们把一些中国传统的故事如西游记、三国演义用马来文写下来。看的人都是当地的华裔，所以马来话很熟。他们的服装、家具、建筑都是遵循着中国的风格。他们没有直接的经验，但总是照着那个方向学习。无论如何，要建造像中国那样的房子，要保留中国的服装。尤其是男人要保留中国的服装，妇女倒不一定。饮食方面多多少少还保留了一些中国人的饮食传统，还有其他的风俗习惯，如结婚，生、死的这种仪式还是保留着，而且认为这是真正的中国的传统风俗习惯。

最近我特别感兴趣的是，这样的一批文物带到巴黎去举办了一个展览，就是“土生华人的文物展览”。在巴黎很受欢迎，许多东西写得还是不错的。许多东西到现在还保留着，这是真正的“华化”。虽然与中国已经没有关系了，但是用他们自己的自觉来保留他们所谓的中华文化。这就是他们所认为、认同的中华文化，与中国本土近百年来的中国文化基本上没有任何关系。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概念：华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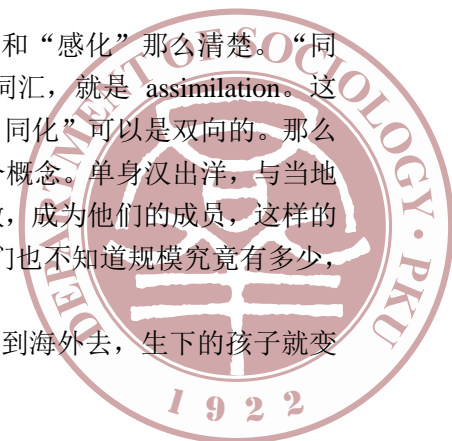
二、“同化”的概念

第二个概念就是“同化”。我为什么用这个概念呢？“华化”和“同化”的不同在什么地方？听了费先生讲的“文化自觉”理论后，自己有了一点想法，并不成熟，需要再深入地考虑。

“同化”这个概念，中国传统里是没有的。后来我才知道，“同化”是一个西方的概念。在传统里，我们用的词是“感化”或“教化”。这些词的意思就是要用中国的文化去教导这些少数民族、教育这些层次比较低的人群，感化他们，使他们能够接受高一层的文化。这些概念是从上到下的。而“同化”这个概念与之不同的地方就是，民族之间不一定有什么上下之分，可以共同互相地交流，互相地感化，也许将来可以融化成为一种新的文化。

这样来思考，“同化”概念的内涵就模糊一点，不像“教化”和“感化”那么清楚。“同化”的概念其实是翻译过来的西方学术词汇，是民族学、人类学的词汇，就是 *assimilation*。这个词从概念本身看，和“汉化”有点像。但“汉化”是单向的，而“同化”可以是双向的。那么这个概念怎么用呢？在早期海外华人历史里，在头两百年，没有这个概念。单身汉出洋，与当地妇女养下孩子，被当地土著同化，加入他们的社团，接受他们的宗教，成为他们的成员，这样的“同化”是有的，但人数不多。并且由于同化之后就不是华人了，我们也不知道规模究竟有多少，完全没有数据。但的确有这种现象。

在我最早看过的一些风土记里面，就提到过这个事情。中国人到海外去，生下的孩子就变



成当地土著，有这样的记录，但到底这个过程是怎么回事，心理上有什么自觉，记录里完全没有。

所以，到了19世纪末或者20世纪初，才谈论“同化”的问题。最初可能也很少谈，因为清朝末年中国的民族主义强盛起来，从孙中山谈民族主义之后，民族的概念就显明了。从前的“反清复明”中也有民族的意涵，但民族主义的概念并没有那么显明。到20世纪初的时候才开始显明。对海外华人来讲，是从20世纪初的时候，就是孙中山到南洋去之后，开始谈革命，谈反清、反满，谈汉人打天下，建立中华民国。之后也谈“五族共和”，根本就不再谈汉族，也不谈“华”。“中华民族”、“五族共和”这些概念都出来了，但是民族主义的概念很强烈。到底民族主义是以汉人为主？还是不谈种族和少数民族地位，整个都是中华民族？这些都不大清楚，也不常讨论。最主要的是，China 成为在政治上有意识的一个地方，Chinese 成为在政治上有意识的一个民族，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不管是汉族、唐人、汉人、华人，这些名称都不要紧，都是 Chinese。所以，这个 Chinese 更加重要了。很显明的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这与西方的民族国家理念有直接的关系，是一个来自西方的概念。西方的概念就是一个国家是一个民族，而且一个民族最适合的政治形式是建立自己的国家。这是西欧的经验带到亚洲来。在亚洲人反帝国主义，反殖民地主义的时候，也有同样的要求。就是你们的民族主义，我们也应该有，你们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我们也应该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反帝运动里，说的也很响亮。在这种情况下，民族主义越来越显明，在海外华人世界里也越来越被重视。同时“华侨”这个名称也越来越响亮，变成一个口号了，就是所有华人都团结起来，抵制帝国主义，抵制殖民地主义。同时与土著明显地区分开，这就是“华侨”的主要概念。就是把华人团结起来，响应中国的现代化，响应中国的新的政治、新的民族主义、新的国家、新的中华民国。就是从那时开始，“华侨”这个概念可以说是相当地政治化、相当地具有政治背景。在这种情况下，“华化”的意思就改变了。

“同化”这个概念在南洋的应用，我现在还分不太清楚，只是有这样一个想法。就是“同化”就是要使海外土生华人的这部分也成为华侨。这是“华化”呢，还是“同化”呢？这还不敢断定。这里面两种成分都有。换句话说，“华化”是说我们要够资格当华人，不懂得中国字、不会讲中国话的人，怎么能叫中国人呢，所以不能叫华人。你要真正“华化”的话，中文要学好，中国话要会讲，才能算是“华侨”。这个压力相当大。我们看到，现在印尼、马来西亚的土生华人中，从他们自己的文献中就能看到，他们也很关心这个问题。他们自己不会讲，孩子也不会讲，不知道从何学起，而且也不愿意学。因为他们有自己的组织、社区和风俗习惯。他们当中有些人已经接受了外国的文化和语言文字，而且学得很好。他们在印尼的，印尼文、马来文、爪哇文很好；在马来西亚的，马来文和英文也很好。同时再让他们学中文，他们学不好，有些也不愿意学。这里就有相当多的矛盾。

在这种情况下，“同化”的概念有两层含义。一个是不允许你被当地的土著和外国人同化，同时要把你们同化为真正的中国人，而不是这种侨生的、不东不西、不懂得中国话、不会看也不愿意学的这种所谓的 Chinese。像这样的标准，压力就相当大。但是，我们如果仔细去看，南洋有好几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现象。总的来说，趋势是各种压力都有。一方面是西方的压力，也就是这些殖民地政府的，他们有语言学校，要求用殖民政府的语言去交流。另外，华人要在当地生存，就必须学土著语言。无论是马来话、泰国话、越南话……都要学当地的语言。这是另外一种压力。再加上中国人之间的压力。因为中国的“新客”——从广东、福建新近到南洋去的，他们会说，你们不是真正的中国人，一定要把你们好好地教化过来，教你中文，让你的孩子上华文学校，重新的“再中国化”。可能这是“同化”的概念，把你同化成为真正的中国人、真正的华人。所以存在几方面的压力，华人也不知道如何去处理。但是那时帝国主义、殖民地政府对中国的民族主义也非常反感，当地的土著同时也发展他们的组织，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也讲他们自己的民族主义。土著人的民族主义对中国的民族主义也非常反感。就是上面这三方面：



中国的民族主义、当地土著的民族主义、再加上西方政府的教育、法律、政治各方面的导向，让华人学习西方文化、接受西方政治法律制度和西方教育。在这种情况下，“同化”的概念就相当复杂。到底“同化”到哪个方向，怎么样“同化”，很难说清楚。

但是就我现在了解的，也是“文化自觉”这个概念让我想到的，就是有个总的趋势很有意思。在这各种压力之下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现代化，接受科技教育。在科技工商方面、在跨国贸易等各方面的影响下，现代化的概念越来越强。当然，现代化和西化不一定分得清楚。但不管是西化还是现代化，总的趋势大家都开始认识到这是一个新的选择。不一定是“华化”，不一定是和土著同化，也不一定是全盘西化。这些都不是必须走的路，但是现代化大家都接受，连中国也接受。这点很重要。也就是说，中国从辛亥革命建立共和国起，到五四运动之后，新文化的总趋势就是接受科学主义，接受新的现代化的东西。就意识形态来讲，还有国际主义。这些大家都看到了。所以，所谓“华化”，所谓民族主义，这些都只是一部分而已，现代化的概念则更广一点。

“同化”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同化”中掺入了现代主义，是现代的同化。这个现代同化可以说是共同的。西方带来一部分，中国接受一部分，从中国也带来一部分。在东南亚，所有新办学校所用的课本都是从中国来的，基本上都是上海出版的。这些课本里所讲的，除了一些传统的概念外，基本上是讲科学。教科书和学校所有的课程里，都在讲现代化。

所以，“同化”不一定是同化于中国传统文化，文化自觉与现代化又接轨了。所以，“同化”这个概念特别复杂。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与“华化”不同。“华化”有保留原来中国的传统文化的意思在里头，而“同化”是接受共同的、大家都能够接受的一些现代的、先进的、进步的思想、进步的价值观。虽然带一点民族主义，带一点传统的文化，但是基本方向是朝着进步的、先进的、科学的这条路走。所以，“同化”概念就掺杂了这许多东西。

三、“异化”的概念

最后一个概念是“异化”。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概念本来我不敢用，因为“异化”还有另外一个含义在。在马克思的思想里，“异化”有另外一种含义，但我说的并不是这个意思，并不是阶级斗争的那种概念，也不是工业革命所讲的那种概念，也不是经济矛盾的概念。

对于这个“异化”的概念，我是这么想的。“异化”这个词，在我们传统思想里面，虽然没有这么讲，但已经有了这样一个概念，就是一种不忠不孝的概念。不接受传统的那些道统，有反抗的意识，有反叛的想法。不忠不孝就是一种“异化”的概念，是文化里一种反正统。在中国传统里面，像走江湖、参与邪教活动，这些可以说都是一种“异化”。当然，这种异化和现代社会的异化性质不同，但在过去，这个概念本身已经存在，虽然没有这个词。如果我们考虑到传统社会已经有“异化”的这种现象，如果用这么一种普遍化的概念来讲，我们现在有没有“异化”呢？

现在从海外看，最近这几十年来，从“中国”这个概念成为一个政治的概念、民族的概念、国家的概念，已经不完全是文化的概念了。刚才我讲的“同化”概念，都有政治意识在里面。“华侨”就是一个政治的概念。那么这样一来，政治斗争、中国内部斗争也带到外国去。海外华人对中国的政治一点都不懂，但是海外社会里也分成不同的集团。受到中国政治的影响，海外社会里这种政治上的区别，各有各的党派，各有各的组织，互相斗争，有些斗争得还相当厉害。

因为有些从中国来的概念，带到海外去以后和当地情况接不上去，一点都不能融合，有的时候根本就把当地社会搞乱了。这些概念在当地的社会并没有适合的需求，可以说是一种人为植入的，不是从海外社会自然发生出来的，而是从国内带来的，一直没有被好好地解释清楚，但是它直接受中国政治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海外华人就生出反感。有一种反感，是不愿意参

加中国内部的斗争，另一种反感是认为中国的那种革命的、反传统的运动，从五四运动开始，他们就不知道怎么去了解，因为他们所带出去并一直保留下来的仍是中国传统文化。所以，他们对中国排除许多自身的文化传统觉得不能接受。所以，这种“异化”的成分就很多，有各种不同的现象。一方面，不理解为什么中国传统的东西都被批评、被排除、被消灭，至少从外部看是这样的现象。另一方面，把与他们没有直接关系的国内政治带到他们那边去，使他们在海外的生活受到影响，使他们在海外与其他民族之间产生许多新的矛盾，使他们在做生意和做其它事情时遇到许多新的困难，和当地政府有许多新的政治冲突，这些矛盾使他们在海外很困窘。

在这种情况下，“异化”就渐渐地表现出来了。就是认为中国的政治、中国的文化演变不一定适合他们这些在海外的华人，尤其是土生华人。这种“异化”情况到底重要不重要？到现在为止，我还不清楚。因为他们虽然不接受中国的政治指导，至少不完全接受，有些地方还坚决反对，但同时他们的经济运营与中国的关系非常重要，需要经常与中国做生意，经常到中国投资、做买卖、进行交流。但是，他们在政治上、意识形态上、文化观念上与中国渐渐有距离了。这个人数有多少呢？我不敢说，但至少在土生华人中，这个现象是相当明晰。这一百多年来，土生华人越来越多，尤其在南洋，现在土生华人已占到80%以上。那么，既然在当地出生，在当地受教育，而且所受的现代教育不是以前殖民地时期帝国主义学校里的那种教育，而是当地民族主义教育，当地民族国家的国家教育，这就使他们对中国的态度受到当地政府与中国的外交、贸易、经济等各方面关系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异化”比较特殊，可以说是文化和认同上的“异化”，但并不影响他们到中国去做生意和投资。所以，情况相当复杂。

我用“异化”这个词是有一点保留的。现在还有一种新的现象，即现在的新移民，近二三十年来去美国、欧洲、澳大利亚等地，这些新移民在心态上和中国的情结还是非常接近的，不同于东南亚的华人。那些在海外出生长大的东南亚华人，跟中国的关系本来就不深，而且越来越浅，所受教育是外国的教育，学讲中国话很勉强，至少南洋的这些土生华人中，能自然地讲中国话的越来越少，除了马来西亚还有一些人进华校之外，受过华文学校教育的学生越来越少。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样思考这种“异化”的现象？和“同化”“华化”相比，如何了解这个概念？有许多问题我还正在考虑。我目前没有什么结论，主要就是想提出问题来供大家思考。

四、中国情结

我最后提出的这几个问题就与“中国情结”有关系。刚才我讲的“华化”和中国情结的奥妙关系就是：“华化”的背后是一种保留中国传统文化的努力，它不是真的要了解中国，也不是真的要被划入原来的中国或者是现在的中国，它是要在它生活的社会里面保留它所谓中国传统文化这样一种概念。这与新的中国有什么关系呢？我认为，这个“情结”还是保留着的，这个“情结”还是很宝贵的，在这个“情结”之下，它的脑子里就有一个“中国”的概念。这个“中国”的概念，与中国人、中华民族与现在的中国的概念还是有相当的距离的。如果还自认为中国人，属于中华民族，自认为是华人、华裔，认为这个传统的文化与他们还有相当的关系，尽量能够保留，这些人对中国还保持有相当的热情。他们并不要完全学中国，也并不要回到传统的中国，他们只是要保留他所认为的中华传统文化，这就满足他的需要了。那么这类人，是否在将来还会存在？他们的“中国情结”会不会使其慢慢接受新中国和新中国的文化，而且因为新中国的文化是现代化的文化，是中国的现代文化，是不是更容易被他们接受？因为他们有中国情结，自认为是中国人的后裔，这个情结是否能把他们原有的“华化”的概念转变为一种新的中华文化，这是个大问题。中国的崛起对这些人会有一些影响，但究竟是什么样的影响，现在还言之过早。我认为，“情结”这个概念可能还是有它的作用的，希望因为有这个“情结”，中国这个概念能够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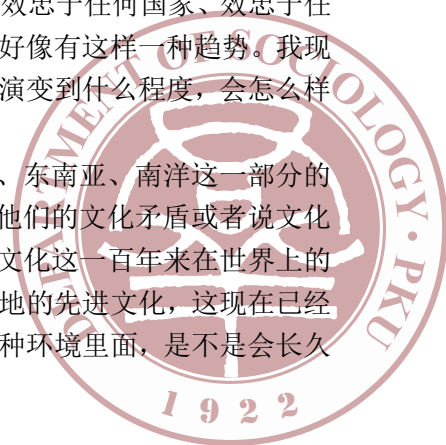
留着。将来中国崛起了，中国的新的现代文化能够形成了，成为一种很可爱、很值得尊敬的、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文化，那么这种“情结”还是有可能使他们渐渐接受新中国的现代文化。是不是会这样，我不敢说，我只是提出这个问题。是过去的“华化”就这样保持下去，还是会从新中国这样一个概念传下去？但无论如何，仍然基本上是文化概念。根据我的理解，绝对不会有政治、意识形态在里面。这些持有当地国家护照的华人，绝对不会承认自己是中国公民，他们还是外国人，但是中华文化——现代的中华文化可以接受。

至于“同化”这个概念。是希望通过中华文化使这些人保持这一传统，同时不被外国人同化。事实上是争取不被完全同化，同时能够维持华人的地位。如果新一代的华人传统能够维持下去的话，他们将来还是与“中国情结”有直接关系。“中国情结”能够使得他们始终关注中国的发展、中国文化的传承、中国政治文化的传承。我想，在“同化”的这种背景里头，这是很可能的。对这一点，我的信心大一点。对于“华化”，我不敢讲，因为对这些土生华人来说，可能很难。但是，在一、两代之后，在“同化”的背景里，部分或全部接受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且能够接受中国新的政治文化，基本上还能够接受中国的政治制度、政治思想。在“同化”这个范围里头，因为他要避免被别的国家和别的文化同化，那么，由于这个“情结”维持与中国的关系，尽量接受中国新起的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如果与他们自己所谓的先进的、进步的文化（如科技，工商管理、财政经济方面）能够接轨的话，他们基本上就能都接受，而且连政治文化都可能接受。这是“同化”的这一部分。

最后“异化”的问题就比较多，不容易说清楚。我感觉最有趣的一点，就是现在这些“异化”的人，他们可能不会接受中国的政治或者说中国的制度，但是他们会接受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成果，会非常地羡慕和非常地向往。经济方面也好，科技方面也好，学术方面的交流，他们都非常愿意和中国更多地来往。所以，“异化”的程度可能就会渐渐地冲淡。

我最后的想法就是，现在海外有一个新的发展趋势很有意思，但这还是一个初步的过程，我看得还不太清楚。就在这三、四十年间，中国沿海跟东亚——不管是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些华人之间的文化关系越来越近，交往的机会越来越多，而且文化的共同点比较显明，互相影响，彼此接受。尤其是年轻一代，不管是马来西亚华人也好，香港人也好，还是中国沿海大城市的这些市民也好，尤其是年轻一代之间的文化交流似乎越来越广、越来越深。这个趋势将来怎么样，我还看不清楚。这个趋势与将来的所谓“中华现代文化”有没有直接的关系，有什么分别，会不会出现一种“东亚性”，恢复整个东亚的共同的一种先进的、进步的、科学的新文化，有没有可能？“异化”的这些年轻人，在我看来他们对这个趋势是能够接受的。这是一种不讲国家、不讲民族、不讲民族国家的文化，是一种共同的东亚文化、先进的文化，好像他们能够接受。这只是我的猜想，我觉得有这个趋势。他们这些年轻人在互相交流的时候，在各方面，文艺方面也好，文学方面也好，电影、服装、建筑……各方面共同的地方好像越来越多，而且好像没有什么争议，都能够互相接受、互相欣赏。是否能够长久下去，现在还看不清楚。那么这个在这些“异化”的海外华人之中，是否能够用这个方法避免效忠于任何国家、效忠于任何民族文化，而朝这种跨国性的、区域性的东亚文化的这个方向走，好像有这样一种趋势。我现在就是借这个机会把这几条不同的路指出来，将来到底会怎么样，会演变到什么程度，会怎么样去发展，尚有待观察。

还有最后一句话，我现在所讲的基本是亚洲的这一部分，东亚、东南亚、南洋这一部分的现象，欧美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华侨、华人的现代社会，他们怎么处理他们的文化矛盾或者说文化选择，还不太清楚。其他这些国家对民族文化的影响也不清楚，西方文化这一百年来在世界上的影响是相当大的，但是以后是不是会照样控制世界文化，影响世界各地的先进文化，这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疑问。欧美的文化毕竟是西方的现代化，华人在欧美文化这种环境里面，是不是会长久



地接受这种文化，还值得考虑。我在和其他一些学者讨论的时候，他们也觉得那里的环境到底与东南亚的环境不相同。所以这种区别将来怎么样的发展，现在还不太清楚。至少，我现在用这三个概念——“华化”“同化”“异化”，先把南洋和东亚这部分、在日本和“四小龙”这个经济圈里的新的文化、这里的影响到底是怎么样的，把这些问题提出来，进行一些初步的分析和讨论，希望引起大家的思考。

【论 文】

民权、政权、国权

——中国革命与日本黑龙会¹

王 柯²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然而中国的“近代”却选择了一条建设民族国家的道路。因此，建设近代民族国家的实践，使中国面对过许多必须从理论上加以阐释、并且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实质性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如何解释“民族”与“国民”之间关系的问题。因为在近代民族国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人首先意识到的民族是“汉”与“满”，而不是在内涵上可以与“国民”部分一致起来的“中华民族”。中国之所以选择走民族国家的道路，首先是与19世纪中期以来中国所面对的国际局势有关。在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面前，为了保卫自己的主权和领土，就不能不说明国家疆界所在。³然而，按照“民族”的范围确定国家疆界的想法，毫无疑问是受到了自称单一民族国家的日本的影响。⁴

以孙中山为首，接受了日本的“民族”和“民族国家”思想影响的革命家们，在实际的生活层面也与许多日本人发生过非常密切的关系。众所周知，有许多日本人大力支持了他们的革命活动，甚至直接加入了辛亥革命的行列，为辛亥革命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但是，这些日本人的活动背景上，有没有日本“民族国家”思想的痕迹？革命家们之所以选择了走建设民族国家道路，与这些日本人支持中国革命之间有无关系？反言之，这些日本人之所以理解和支持中国革命，与革命家们选择了中国走民族国家道路之间究竟有无关系？如果以上可以得到肯定的回答，那么这些日本人为什么会支持革命家们选择民族国家的道路，他们在革命家选择民族国家道路的问题上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搞清楚这些问题，就可以明白究竟是一些什么样性质的人士，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支持了一百年前发生的那场中国革命，这对于帮助我们加深理解辛亥革命性质以及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应该具有一定的意义。

¹ 本文刊载于（香港中文大学）《21世纪》第127期。

² 作者为日本神户大学大学院教授。

³ 参见拙著《走向民族国家——中国近代民族国家思想的国际背景》，商务印书馆，近刊。

⁴ 参见拙文《“民族”，一个来自日本的误会》《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Sociology of Ethnicity*, 2010年第70期，第1-12页。该文曾于2003年发表于香港中文大学《21世纪》第77期，此次转载时曾做大量补充修改。

